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涂晓艳

内容提要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兴起与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动及全球性问题的密不可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为安全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目前还不够成熟,存在争论。由于传染病具有突发、多变及后果严重等特征,同时,安全的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因此,对传染病与安全问题的考察需要立足于动态和战略高度。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传染病 安全研究 治理 战略

将传染病纳入安全研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领域逐渐兴起的话题。2003年“非典”的爆发不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带来负面的影响,由此揭开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传染病问题的开端。中国人口众多、分布密集等特点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中国的经济、医疗等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为传染病的防治带来一定的难度。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和传染病病毒的变异,过去已经得到根除的传染病正在复发,而新传染病正在以每年一种的速度增加。显然,根据对中国国情的现实考量,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给予传染病与安全问题足够的重视具有现实意义。循此思路,本文拟对国内外学界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作一番考察和思考。

* 涂晓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邮编 453007)

** 本文系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课题《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项目号:11160)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教授和《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的匿名专家及编辑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一、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兴起

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传染病与安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传染病属于生物医学领域,而安全则属于国际政治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虽然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大量历史事实显示,传染病通过使人口锐减,影响战争进程和战争结果,以及造成社会动荡等形式威胁国家安全,但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比两者在事实上存在的联系要晚得多,主要原因不仅包括国际政治学科建立的时间,还在于人们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程度不够。笔者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传染病问题与安全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其中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政治系的丹尼斯·皮瑞杰(Dennis Pirages)教授堪称最早阐述该问题的学者。1995年,他在《微生物安全:疾病机制与人类福祉》^①一文中首次将传染病与安全结合在一起并纳入政治学的研究中。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普里斯·史密斯(Andrew T. Price-Smith)也是在传染病与安全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并积极向前推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曾指出,“从1900年中期以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已经推测新发或复发传染病可能通过它们对主权国家的消极影响而构成对国际安全的威胁”。^②他在1999年发表的《基加利的鬼魂:世纪之交的传染病与全球稳定》^③一文中主要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为案例,指出冷战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在下降,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威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导致的威胁却一直处于安全研究的边缘地位。然而事实上,南部非洲的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正在威胁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也对全球安全存在着风险。

研究传染病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国际关系学者和著作屈指可数,直至“9·11”事件发生之后。出于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心,传染病问题开始吸引了一部分学者的目光。此后,关于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如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普里斯·史密斯的两本关于传染病与安全的著作:《国家的健康:传染病,环境变化和它们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影响》^④与《传染病与混乱:全

① Dennis Pirages, “Microsecurity: Disease Organisms and Human Well-being,” *Washington Quarterly* 18, No. 4, 1995, pp. 5-12.

② Andrew T. Price-Smith, *Contagion and Chaos: Disease, Ec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p. 1.

③ Andrew T. Price-Smith, “Ghosts of Kigali: Infectious Disease and Global Stab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54, No. 3, 1999, pp. 426-442.

④ Andrew T. Price-Smith, *The Health of Nations: Infectious Diseas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全球化时代的疾病、生态和国家安全》、^①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斯蒂芬·埃尔伯教授(Stefan Elbe)的《安全与全球健康:通向不安全的医学化》、^②《艾滋病是否应该被安全化:艾滋病与安全联系的伦理困境》、^③《病毒警告:安全,治理性和艾滋病大流行》、^④以及威廉与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的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的《流行病与国家安全》^⑤等。还有一些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传染病与安全问题,如从宏观视角思考的《健康中的全球政治》、^⑥从地区角度进行讨论的《疾病与安全:东亚的自然瘟疫和生物武器》,从安全高度对传染病进行治理的《使传染病安全化》^⑦和《健康、安全和外交政策》。^⑧

《外交事务》《国际研究季刊》《国际安全》等刊物也连续发表了相关文章。^⑨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研究所和国际组织也纷纷发布报告,如美国兰德公司在2003年发布的《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重建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政策》、^⑩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06年和2009年分别发布的《公共健康与国际安全:印度的案例》^⑪和《国家安全和全球健康:美国国防部全球健康参与的分析》。^⑫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发布了《一个更安全

① Andrew T. Price-Smith, *Contagion and Chaos: Disease, Ec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② Stefan Elbe,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Toward the Medicalization of Insecurit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10.

③ Stefan Elbe, "Should HIV/AIDS Be Securitized?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Linking HIV/AIDS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1, Mar., 2006, pp. 119-144.

④ Stefan Elbe, *Virus Alert: Security,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AIDS Pandem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⑤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Winter 2002/3, pp. 43-81.

⑥ Sara E. Davies, *Global Politics of Health*,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10.

⑦ Sara E. Davie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Mar., 2008, pp. 295-313.

⑧ Colin McInnes, Kelley Lee, "Health,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Issue 1, Jan. 2006, pp. 5-23.

⑨ Sara E. Davie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pp. 295-313; Stefan Elbe, "Should HIV/AIDS Be Securitized?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Linking HIV/AIDS and Security," pp. 119-144.

⑩ Jennifer Brower, Peter Chalk, *The Global Threat of New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Reconciling U. 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Rand Corporation, 2003.

⑪ Pramit Mitta, Teresita C. Schaffer, *Public Health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ase of Ind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60731_aids_india.pdf. CSIS. 2006, 2013-06-20.

⑫ Gene Bonventre, Kathleen Hicks, Stacy M. Okutani, *U. S. Nat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An Analysis of Global Health Engagement by 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ce*,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090421_Bonventre_USNationalSecurity_Rev.pdf. CSIS. 2009, 2013-05-13.

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①和《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② 这两份报告对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威胁安全的来源包含了更为宽广和具体的内容,即不仅包括以往被看作传统安全的问题如国家间冲突、国家内部冲突等,也包括许多在以往被看做是社会性或者全球性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的袭击等。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发布的《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③中也提到传染病对国家、全球的安全构成了挑战。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则从传染病问题安全化的角度出发,发布《传染病的威胁:为何不安全化》^④和《使非典成为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⑤两份报告。

这场关于传染病与安全的讨论不仅局限在学术研究,也引起一些国家政府的关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指出,“传染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⑥在这份报告中,国家情报委员会表示,“在未来20年里,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将使美国 and 全球安全更加复杂。这些疾病会使美国海内外的市民陷入危险、威胁美国部署海外的军队、加剧那些美国有重要利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政治不稳定”。^⑦同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对全球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他认为,“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来说,艾滋病不仅是人类危机,也是一种安全危机,因为艾滋病威胁的不仅是个人,还有重要的机构。这种疾病削弱劳动力,减弱经济力量。艾滋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威胁之一”。^⑧2001年6月,俄罗斯首席卫生副部长根纳迪·奥尼先科(Gennadi G. Onishchenko)称艾滋病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时也提到:“卫生安全是

① 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提要,(A/59/565)。http://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text_summary.htm,2013-05-23。

② 联大秘书长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中文版),A59/2005,第23页。

③ 世界卫生组织,《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7/9787117091008_chi.pdf,2013-06-11。

④ Mely Caballero-Anthony, “The Threat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hy Not ‘Securitize’?” Pacific Forum CSIS, July 7, 2005.

⑤ Mely Caballero-Anthony, “Make SARS A Security Priority,” Pacific Forum CSIS, April 17, 2003.

⑥ D. Gordon, “The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NIE 99-17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00.

⑦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The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rinted i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Report 6,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0, p. 5.

⑧ Al Gore, “Text: Vice President Gore’s Remarks on AIDS to UN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10, 2000, www.aegis.com, 2013-04-25.

⑨ David E. Powell and Heidi A. Kostin, “Rapid Spread of AIDS in Russia Imperils a Generation,” *Boston Globe*, 10 February, 2002.

国家安全的一部分。”^①

二、国外学界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

由于传染病与安全的交叉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国外学界有关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涉猎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各个层面,但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传染病是否应该上升为安全问题

传染病是否应成为安全问题,是传染病与安全研究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有关传染病与安全相联系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但在对该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安全长期与军事安全等同,而传染病则是医学问题等一些固有认识,人们对传染病问题是否应该成为安全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尽管传染病频繁发生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但仍有一些学者对传染病上升为安全议题感到困惑,如斯蒂芬·埃尔伯指出,艾滋病自发现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公共健康和发展问题,直到2000年才出现转折,被认定为安全问题。^②他认为,尽管把艾滋病安全化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比如可以通过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意识,推动社会对疾病的反应,但也会带来一些缺陷,比如安全框架会抵御威胁的逻辑可能会削弱国际社会努力解决艾滋病问题,把艾滋病说成是具有压倒性的威胁不利于对艾滋病的正常的社会认知等。这些潜在的问题对于艾滋病是否应该被纳入安全层面产生了深刻的伦理困境。斯蒂芬·埃尔伯认为,安全理论不能解决这种复杂的困境,但是由于这种困境的存在所带来的意识的提高允许政策制定者、活动家和学者将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将传染病与安全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对传染病类别的区分也是造成传染病是否应该上升为安全问题讨论的原因,2007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全球健康的克里斯汀·艾尼马克(Christian Enemark)等人合著的《疾病与安全:东亚的自然瘟疫和生物武器》^③一书强调一些特定传染病,如2003年出现的非典(SARS)和禽流感(H5N1)是对安全的挑战,而生物武器的使用不管对个人还是对政府都是一种安全威胁。该书还提到实验室里的病原体实验虽然对科学有促进的一面,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将造成一定的安全风险,如爆发传染病等。由于世界各地的经济、信息和资源存在差异,把传染病纳入安全议题引发了一些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和信息等方面不能公平分

①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机制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 Stefan Elbe, "Should HIV/AIDS Be Securitized?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Linking HIV/AIDS and Security."

③ Christian Enemark, *Disease and Security: National Plagues and Biological Weapon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7.

配的担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健康和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哈利·费得邦等人合作发表的《全球健康与国家安全,批判参与的必要性》一文指出,“把全球健康议题作为国家安全威胁可能会使注意力不成比例地聚焦在那些只对富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疾病,而不是对全球健康构成最大威胁的疾病或国家,而研究全球健康需要我们密切注意那些全球健康和国家安全利益相重叠的地区。”^①

(二) 传染病与安全的关系

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对其的认识也在打破传统的学科分化障碍,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过多的讨论传染病应该成为安全问题与否,而是直接讨论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传染病与安全相互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像传染病是否为安全问题那样具有争议,相关研究论著主要聚焦在两个层面,即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其中从国家层面来看又划分为不同的方面,如传染病会造成冲突、削弱国家能力等。美国生物和生化武器专家乔纳森·塔克(Jonathan B. Tucker)在2001年发表的《传染病的恐惧,传染病和国家安全》^②一文中指出,在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美国面临着超越传统定义上国家安全的新挑战,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传染病的重新出现。传染病不仅直接威胁美国公民,而且毁灭性的流行病如艾滋病在全球内的扩散,影响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并导致其产生冲突。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的苏珊·彼得森在《流行病与国家安全》^③一文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该文从现代世界中传染病的严重性入手,从安全的视角分析传染病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并阐述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彼得森认为,一方面传染病可能会通过改变均势,造成对外政策冲突和产生社会影响三种途径引发国内冲突或者国际战争;另一方面,传染病也会在军事准备和生物武器(Biological Weapon)等方面影响战争的结果。至于如何理解国家安全及传染病通过何种方式威胁国家安全,安德鲁·普里斯·史密斯从另外的角度做出了解释。他论述了传染病与环境改变、国家稳定、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包括很多方面。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传染病会削弱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大小又会反过来影响传染病控制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对安全的界定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冷战结束后,有学者认为国家层面的军事安全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开始重点关注人的安全,也有学者在不否

① Harley Feldbaum, P. Patel, E. Sondorp and K. Lee., "Global Health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Need for Critical Engagement," *Medicine, Conflict and Survival*, Volume 22, Issue 3, 2006, p. 192.

② Jonathan B. Tucker, "Contagious Fear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June 22, 2001.

③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43-81.

定国家层面的安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时,把眼光转向了人的安全。代表性的著作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Sara E. Davies)在2010年出版的《健康中的全球政治》,^①该书分别从国家视角和全球视角探讨了健康与国际关系中的相关议题。从国家视角关注国家的作用并试图寻求健康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位置,这种方法主要讨论国家在面对疾病时的反应,以及国家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合作来降低这种威胁。全球视角则是对人的安全的考虑,关注人的需要、人的安全 and 健康平等等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的全球威胁》^②一文也明确表示,传染病对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是因为它有可能影响人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能力。

(三) 传染病的安全化

受传统安全观的影响,对传染病是否应该被纳入安全框架内一直存在争议,但传染病在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风险又不能掉以轻心。因此,自21世纪初开始不断有学者和机构开始呼吁使传染病问题安全化。2008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发表的《使传染病安全化》^③主要讨论了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两个主要行为体在使传染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在过去十年里,国际关系领域对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认识一直在提高。太平洋论坛也提出使传染病问题安全化的主张,其发布的两篇报告《传染病的威胁:为何不安全化》^④和《使非典成为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⑤认为传染病仍然被许多国家认定为医学问题,即医学化传染病问题而不是安全化传染病问题。这两篇报告指出,除非在思想上和态度上认识到传染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安全议题,否则很难使政府能够采取及时和果断的行动。针对传染病安全化的问题,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斯蒂芬·埃尔伯教授(Stefan Elbe)的《安全与全球健康:通向不安全的医学化》^⑥一书打破了传统上对国际关系中安全与不安全的理解,分别对非典、流感、生物恐怖主义和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如抽烟、酗酒和毒瘾等案例进行分析。他在前人对健康与安全之间相联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健康的“安全化”概念,即不安全的“医学化”。在斯蒂芬·埃尔伯的《病毒警告:安全,治理性和艾滋病大流行》^⑦一书中,对艾滋病的安

① Sara E. Davies, *Global Politics of Health*.

② Jennifer Brower, Peter Chalk, *The Global Threat of New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Reconciling U. 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Rand Corporation, 2003.

③ Sara E. Davie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pp. 295-313.

④ Mely Caballero-Anthony, "The Threat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hy Not 'Securitize'?"

⑤ Mely Caballero-Anthony, "Make SARS A Security Priority."

⑥ Stefan Elbe,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Toward the Medicalization of Insecurity*.

⑦ Stefan Elbe, *Virus Alert: Security,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AIDS Pandemic*.

全化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了三方面:首先用经验证据证明艾滋病是安全议题;在与疾病相关的情境下使用时,安全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在安全的语言下,艾滋病大流行会导致的政治后果。

不管是传染病的安全化还是安全的医学化研究,都寄希望于把医学问题与安全议题进行有效结合,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保障安全,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此,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使传染病在安全的框架下得到有效防治。从国家安全政策入手的有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科林·麦克尼斯(Colin McInnes)和凯莉·李(Kelley Lee),他们合作发表的《健康、安全和外交政策》^①一文主要讨论了公共健康、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希望在安全政策方面提高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除了在政策方面做出努力外,信息在防止传染病的流行与扩散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及时而准确的信息不仅可以使一个国家及时采取措施,而且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阻止传染病在全球化时代的大流行。对此,2006年兰德公司发布名为《传染病与国家安全:战略信息需要》^②的报告指出,艾滋病和非典的发生使大家认识到,传染病成为美国和世界安全最重要的威胁,为了认识和缓解这种威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得到准确和及时的传染病信息,因此国家信息系统的建立和评估是必要的。

三、中国学界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

传染病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传染病问题的发生此次数分别是:“周代1次,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③随着传染病病毒的变异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近年来旧型传染病不断复发,而新型传染病问题又不断出现,以致使传染病在现在和未来仍然可能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来源。中国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其实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中国古代称为“疫”。随着医学的发展,概念逐渐专业化,而对传染病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开始逐渐呈现。根据中国医学史的学术研究倾向来看,传染病问题应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学界对传染病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相关研究也在增多,尤其是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更是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主

① Colin McInnes, Kelley Lee, "Health,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pp. 5-23.

② Gary Cecchine, Melinda Moor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Information Needs," RAND, 2006.

③ 转引自陈昊阳:《我国重大传染病态势及对国家人口安全影响的研究》,第三军医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页。

要体现在如何对传染病进行安全化的研究、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如何治理传染病问题等方面。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说,中国针对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还需要跟进一步的丰富和系统发展。

(一) 传染病与安全

早在 2003 年“非典”在中国的爆发就已经引起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传染病问题与安全的相关思考。王逸舟教授撰写的《非典与非传统安全》^①一文,认为从非传统安全的特征来看,“非典”是一种非传统安全。从非传统安全思考既是对既有的应对机制及观念的反思,也将提高处理危机的能力。2006 年,有学者讨论了历史上和当今威胁全球安全的传染病,以及艾滋病和“非典”等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如何开展国际合作防治传染病等。^②随后,有学者从安全化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公共卫生机制问题。^③罗艳华教授则撰文主要以“甲流”和“非典”为例,认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从全球化、世界贫富差距等方面分析了关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原因,并详细分析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安全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中国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④2012 年,有学者则撰文强调,流感大暴发、艾滋病、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使得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趋势不容乐观,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打乱并逆转全球化进程,以及艾滋病的蔓延对南部非洲国家将继续构成严峻挑战等国际政治影响。^⑤

由于传染病与安全是跨学科研究,因此,其他学科领域如语言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也有少量涉及。其中,有学者对传染病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传染病对国际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引起社会恐慌、助长地区紧张和国家间的不信任等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国防安全和政府安全的四个方面,并建议建立全球传染病防治安全机制。^⑥也有学者对我国重大传染病的态势做了整体分析,并用安全视角分析了这种态势对国家安全和人口安全的影响。^⑦

① 王逸舟:《“非典”与非传统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23—25 页。

② 李少军:《当代全球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以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变迁为例》,《国际论坛》2008 年第 2 期。

④ 罗艳华:《全球公共安全的缘起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⑤ 程春华、杨久华:《未来中长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第 20—30 页。

⑥ 段青、陈玉洁:《传染病对传统国际安全范式的挑战》,《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8 期;段青:《传染病与国际安全》,《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第 12 期。

⑦ 陈昊阳:《我国重大传染病态势及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第三军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二）传染病与全球健康治理

如何应对和治理传染病问题对安全构成的威胁是预防和治理传染病问题的关键。对此,国内出现了一批关于全球健康治理的研究成果。但对如何治理的问题,研究成果呈现不同角度。例如,从国际法角度讨论,主要包括全球健康问题的出现与公共健康全球合作、人权与公共健康全球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展与变革等内容。^①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思考,等等。^②

从整体上看,国内近年来关于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但相对于国外来说,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选取的病例主要是以新近在中国出现的“非典”和流感作为案例。除此之外,对如何治理传染病问题的研究成果介绍居多,剖析传染病威胁安全的研究相对缺乏。但是传染病问题防范重于治疗,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能使人们更直观地认识到传染病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在卫生发展水平和医疗环境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与改善,但作为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和正在和平发展中的大国,有效防治传染病、保障国家安全免受传染病问题的威胁,是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传染病与安全研究所必要的。

四、几点思考

综观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外学者和中国学者对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缺乏历史视角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费德勒(David P. Fidler)曾指出,“在1990年以前,不管哪种类型的传染病控制都没有得到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视。”^③他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指出,“在过去十年里,健康问题已经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议题受到了很大的关注”。^④由此可以看出,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是冷战

① 龚向前:《传染病控制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陈颖健:《公共健康全球合作的国际法律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分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曾瑞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国家利益》,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David P. Fidler, “Germs, Governance, and Global Public Health in the Wake of SAR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Vol. 113, No. 6, 2004, p. 800.

④ David P. Fidler, “Architecture Amidst Anarchy: Global Health Quest for Governanc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Vol. I, No. 1, January 2007, p. 1.

结束以后新出现的事物。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忽视了对历史的考察。首先,传染病与安全相联系的历史渊源被广泛忽视。众所周知,传染病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虽然国际政治学科建立时间较晚,但政治与历史往往有共同的学术祖先。身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先驱人物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的爆发时间、传播路线、主要症状及特征等。该书认为瘟疫是导致雅典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修昔底德也由此成为第一位把疾病考虑到影响战争进程和历史发展之中的史学家。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遵循传染病与安全研究是冷战后的产物,并没有深入挖掘历史材料。其次,缺乏对传染病历史的把握。自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兴起以来,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近年来的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非典”等,历史上的许多传染病及其对安全的威胁并没有被纳入其中。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传染病都是致命的,而且目前正呈现复发的趋势,如原本已经得到控制的结核病现又在许多国家开始流行与扩散。

(二)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需要系统、动态的考察

不管是传染病还是安全,都属于动态的概念。首先,安全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冷战结束以前,传统安全包括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占据安全研究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安全的含义开始进一步扩大,内容也随之扩展。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出现使传染病逐渐被纳入安全研究的范围中。其次,传染病长期属于医学范畴,虽然从古至今对安全造成威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并没有引起国际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全球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传染病由于本身的突发性、传播快、后果严重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此外,随着抗生素的使用,过去的一些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人们的防范意识也因此削弱,但近年来环境恶化、抗生素过度使用等情况催生了原本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如结核病等重新复发。一些新发传染病也正以每年一种的速度出现。这些现实都使得我们不能静止地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不管出现何种变化,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割裂。尽管当前安全一直都是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属于“高级政治”问题,而传染病问题虽被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安全研究中,对其定位却仍然属于“低级政治”范畴。但是,传染病与安全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内容,不管是对传统安全还是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传染病其实都在安全的范围内。

通过对安全在自身逐步的演化过程中如何与传染病产生关联和二者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传染病与安全的关系并不是断层的,而是有系统的联系。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才能使人们提高对传染病的认识,从长远来思考如何防止传染病的爆发,从而达到使

传染病在现实的国家政策中能够真正获得安全的高度,而非仅仅停留在讨论或理论的层面。

(三)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不是一项应急性研究,而是一项长期战略性研究

传染病问题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因此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传染病与安全的研究不是一项短暂的工作。而且新发传染病往往具有发病突然、传播速度快、病因不明等特点,预防这种传染病不能像对古老传染病那样等待疾病流行才开始控制,而是需要建立长期的机制来预防。目前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传染病在流行后往往会在学术界产生一股研究潮流。以 2003 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为例,“非典”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传染病问题的分水岭,在其爆发后的几年内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但遗憾的是对该问题的研究并没有持续和深入。有效防治传染病首先需要从思想和行动上防止传染病的爆发与流行,而不是仅局限于爆发后如何控制。从国外的研究中发现,自传染病与安全问题研究兴起以来,其成果一经产生便很快被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而转化为政策措施,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传染病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如此一来,传染病与安全研究作为一项长期课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